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三卷

天皇制的建立

信夫清三郎 著
呂萬和 等譯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三卷

天皇制的建立

[日] 信夫清三郎 著

呂萬和 熊達雲 張 健 譯

桂冠圖書公司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近代政治史／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
-- 初版。-- 臺北市：桂冠，1990〔民79〕
冊； 公分。-- (桂冠政治學叢書；
18-21)

含索引

ISBN 957-551-137-9 (一套：平裝) 。--
ISBN 957-551-140-9 (第三冊：平裝)

1. 日本—歷史—近代 (1875-1905) 2. 政治—日
本

731.26



桂冠政治學叢書[20]

日本近代政治史(三)

原 著／(日) 信夫清三郎
譯 者／呂萬和等
執行編輯／萬嘉玲
發行人／賴阿勝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 10769 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 話／3416949・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登 記 號／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 年 12 月 (印數：1~1,00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 價／新臺幣 250 元
ISBN 957-551-137-9 (套)
ISBN 957-551-140-9 (第三卷)

凡 例

一、敘述方法按照第一卷的凡例。

二、關於民選議院或選舉等詞的表述，在明治時代是不固定的，有時使用「選」，有時使用「撰」。本卷除 1874 年的《民撰議院設立建議書》這種固有的表述外，在引用文獻時，亦基本統一寫作「選」字。同樣，「洲」和「州」，除西鄉隆盛的「南洲」外，都統一寫作「州」，「附」統一寫作「付」。

三、本卷，在句子的末尾常常標有「？」。「？」大致分為三種用法。第一是單純的疑問符號，由於不能確定事實而表示「不明白」。第二是自問自答的符號。本卷第五頁第二段「日本的貴族幹了些什麼呢？」是自問，第三十頁第五段的「島津久光……」以下是自答。第三是表示假設。自第十七頁的最後一行到第十八頁的第一行「難道民治不是以切身的感受注視著這種村民生活的混亂的嗎？」就不是單純的疑問符號，而是表示一種大概如此的假設。由於沒有可靠的資料能夠說明杉民治的真實意圖，因此避免用肯定的詞語，而以假設方式來表達著者「諒必如此」的見解。

序

1

本書是我以通史形式敘述近代日本政治史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第三卷。本卷主題是天皇制的建立和「國民」(nation)的形成。

十九世紀義大利獨立運動政治家阿塞利奧^❶曾大聲疾呼：「我們創造了義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義大利人！」（博伊德·謝菲爾著《民族主義的諸面貌——新現實與舊神話》，收穫書店1974年版，第11～12頁。d'Azeglio 「We have made Italy, now we have to make Italians」）。

明治維新的課題也一分爲二：創立「日本」與形成「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萬國對峙的中央集權「國家」；後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課題，即爲了利用人民的創造性和全體意見支持這個國家，從而實行改革以形成「國民」。

創立與萬國對峙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一課題，如果追根溯源，恐怕要以培理來航前夕作爲開端。當時，在海防爭論中已從政策思想方面提出了集結「國內全體之力」、「日本全國之力」、「整個國家之力」、「統一和睦之力」等的必要性。海防爭論產生於怎樣

❶阿塞利奧(Azeglio Massimod, 1798～1866)，義大利政治活動家和作家，主張在薩瓦王朝統治下統一意大利，曾任皮蒙特內閣首相和外交大臣(1849～1852年)。

對付西歐衝擊的政策爭論，並因培理來航而達到了高潮。如果再向前追溯，則應以對付西歐衝擊已上升到政策思想高度之時為開端。寬政四、五年間（1792～1793年），老中松平定信在接待俄國使節拉克斯曼之後，看到了「蠻國精通事理」而開始蒐集「紅毛②之書」，即其發端。雖然定信沒有那種立即把「蘭書」③付之「公用」的熱情和抱負，但他看到了「蠻國精通事理」，並開始蒐集蘭書。這就表明當權者已為對付西歐衝擊採取了最初措施。

重新估價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時代，把它看作近代的先驅時代，這種努力是最近學術界的一大特色，而此在文化領域中尤為顯著。美學者瀨木慎一指出：「把連續長達二百七十年的德川政權時代，在文化史上籠統地看作一個時代是不妥當的。」他強調說：「室町末期至元祿時代繁盛起來的近世初期文化，最多至十八世紀後期尚有幾分影響。此後，新型文化就異軍突起了。」他敦請人們注意，「從美術史上來說，明和二年（1765年）春信④發展錦繪⑤，使浮世繪⑥版畫出現了絢麗的色彩，這時已是新舊更替時期」，而「春章⑦、清長⑧、歌麿⑨、榮之、寫樂⑩等人活

②紅毛，特指荷蘭人，泛指西洋人。

③蘭書，荷蘭文之書，泛指洋學。

④春信，即鈴木春信（1725～1770），浮世繪畫家，錦繪的創始人。

⑤錦繪，彩色浮世繪版畫。

⑥浮世繪，日本的一種民間繪畫，大都描寫人情世態、下層社會，始於十七世紀初，盛於十八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漸趨衰落。

⑦春章，即勝川春章（1726～1792），江戶中期浮世繪畫家。

⑧清長，即鳥居清長（1752～1815），浮世繪畫家，擅長美人畫。

⑨歌麿，即喜多川歌麿（1753～1800），江戶後期浮世繪畫家，擅長美人畫。

⑩寫樂，即東洲齋寫樂（生卒年不詳），俗稱十郎兵衛，江戶中期浮世繪畫家。

躍的天明、寬政時代到十九世紀初的文化、文政^⑪時代，情況已完全改變」。他得出結論說，如果「把一個時代的人們感覺所及範圍規定為近代」，那麼「原來劃為近世後期的時期，確切地說，稱作近代初期也許更為合適」（瀨木慎一著《江戶後期文化的再認識》，《朝日新聞》1974年6月5日）。在文學家前田愛主持召開的「幕末文學」座談會上，就思想史家野口武彥所提出的「廣義的幕末開端」問題展開了討論。其中，比較文學家芳賀徹作了如下發言：

「說到日本的思想，在對事物的思考方式、感覺方式的大潮流中，在到處出現與以往方向迥異、矢量^⑫不同的時代，……我感到，似可把那以後叫做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的幕末時期乃至日本的近代時期。十八世紀七〇年代或八〇年代，……所謂的蘭學者開始出現，根據內心的要求，把目光轉向西方科學，直接閱讀蘭書。在他們的視野裡，西洋的文明開始大量湧現，而中國的世界則相對地成為地球上的一部分。一方面，在把中國文明變成相對的文明這一點上，國學經常與蘭學攜手合作，而其自身也異常倔強地勃然發展壯大；另一方面，……且不用說茶山^⑬、六如^⑭等新感覺派的漢詩詩人相繼湧現，上方的蕪村^⑮、上田秋成^⑯、江戶的平賀源內^⑰以

⑪文化、文政時代，又稱化政時代，時在1804～1872年。

⑫矢量(Vector)，即「向量」，數學名詞，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量。

⑬茶山，即菅茶山（1748～1827），江戶後期的儒學家，漢詩詩人，名晉仲，通稱太仲，號茶山，著有詩集《黃葉夕陽村舍詩》等。

⑭六如（？～1801），名慈周，號無著庵、葛原、白樓，江戶中後期天台宗的著名學問僧，工漢詩，著有《葛原詩話》等。

及大田南畝¹⁵等劇作者，也以緊密呼應的形式，創造出了一個堪稱浪漫主義新的詩文世界。」

「這種變化，例如在儒學中也已出現，但不限於儒學一家，在其他新的學術領域以及文藝世界、美術世界也同樣發生了許多變化，事實上在衆多方面各自的才能已開始發揮。所以，按照海辛哈¹⁶的話來說，就是各種文化活動不是一花獨放，而是結成一體，互相促進地開始行動。十八世紀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前後，是趨向被稱之為幕末的時期，也可以說是日本人的精神狀態開始崩潰之時。一言以蔽之，與這種「崩潰」相適應，各種才能相當自由地，一方面以浪漫主義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以民族主義的形式開始新的探索。我認為，這種時代應當稱作幕末的開端。」（《日本文學座談》第十一冊，幕末文學，學生社1977年版，第91～92頁）。

政治史的分期與文化史的分期並不一致。因為政治史的分期，尤其與當權者的意志有關聯。但是，如果說「文化活動結成

¹⁵ 上方的蕪村，上方指京都及畿內地區，蕪村，即與謝蕪村（1716～1783），江戶中期俳人，畫家，有《蕪村七部集》和《野馬圖》等。

¹⁶ 上田秋成（1734～1809），江戶後期的國學者、歌人、小說家，著有《雨月物語》等。

¹⁷ 平賀源內（1729～1779），江戶中期本草學者、劇作家，著有《風流志道軒傳》、《神靈知渡》等。

¹⁸ 大田南畝（1749～1823），江戶後期狂歌師、劇作家，為狂歌三大家之一，著有《萬載狂歌集》等。

¹⁹ 海辛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蘭歷史學家，著有《中世紀的秋天》等。

一體，互相促進地開始行動」，那麼老中松平定信懂得「蠻國精通事理」並開始蒐集蘭書，也處身於這種文化活動的潮流之中了。文化史上劃作「幕末開端」的時期，政治史上也可以劃作「幕末開端」時期，雖然兩者有發自內心與來自外界之別，也有時間上的參差。

政治史上的幕末維新史，是作為政治鬭爭而展開的。自從老中松平定信的意志決定以後，靠何種政治勢力以及用何種形式來抵擋西歐的衝擊，由誰以何種方式創立與萬國對峙的集權體制，換言之，由何種政治勢力來承擔創立集權國家，這便是政治鬭爭的中心課題。文政七年（1824年）常陸大津濱發生的事件^⑩又增加了一個課題。這起事件表明庶民並沒有把西歐的衝擊看成是衝擊，尚未具備與西歐衝擊相對抗的「國民」意識。會澤正志齋在大津濱事件後的第二年撰寫了《新論》，曾在幕末時期風靡一時，使許多志士奮起，這就充分表明了那起事件的重要性。庶民的同樣操行，在元治元年（1864年）馬關戰爭中更加顯露。這樣，幕末維新史肩負著創立「國家」和形成「國民」的雙重任務。「國家」的創立，自慶應三年（1868年）的「王政復古」——建立朝藩體制以代替幕藩體制——發展到明治二年（1869年）的「奉還版籍」——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形成國家的土地所有制以代替領主的土地領有制——而開其端緒，又依靠立足於啓蒙主義的西歐化和近代化的政策——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文明開化——進入到正式的國家建設階段。本書第二卷的中心是敘述立足於啓蒙主義的國家建設，本卷繼第二卷之後，將繼「日本」創立之後而形成的「日本人」提到了議事日程，把敘述的重點放在描述日本政治史的特殊形態，即：在「國家」的建設以天皇制的確立而結束的過程中，

^⑩ 1824年，英國捕鯨船員在常陸大津濱登陸，要求供給柴薪和淡水，水戶藩予以拘留，後釋放。

「國民」(nation)的形成則成了「臣民」(subject)的形成。

「國民」的形成被提到議事日程是在明治五年至六年。當時，赴美歐考察的木戶孝允，在波蘭接觸到亡國的人民，很受震動，回國後便於明治六年七月和九月草擬了關於制定憲法的意見書，強調以國會為媒介來統一人民的必要性。明治七年，陸奧宗光向木戶提交了關於批判有司專制的意見書，其意見書恰好以「日本人」為題。木戶提出的「國民」的形成發展為「臣民」的形式，這一過程與下面的過程相呼應：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所描繪的「君民共治」(立憲君主制)設想，在與同樣要求「君民共治」的自由民權運動的對抗中，屈從於伊藤博文所設想的「立憲君治」

(立憲絕對主義)。伊藤博文憑藉大日本帝國憲法實現了天皇制的制度，山縣有朋則憑藉教育敕語宣布了天皇制意識形態。兩者都描繪出了立憲君主統治下的「臣民」的形象，而臣民的觀念則在天皇的權威隨著日清戰爭的勝利而提高的過程中紮根於人民之中。自由民權運動要求形成「國民」，「有司專制」則要求形成「臣民」，兩者鬭爭的過程，同時也是形成國民的要求與對國家建設(文明開化)的批判提出「第二次維新」的過程。但是，當國民的形成變成臣民的形成，當日清戰爭使臣民意識在人民中紮根之時，第二次維新的要求也就在日清戰爭中流失，資產階級革命終於流產。

如從最廣義的範圍來看，明治維新是為了解決對付西歐的衝擊而建設與萬國對峙的國家，同時也是形成國民的過程。它始於當權者——德川幕府的老中松平定信——首次把對付西歐的衝擊作為政策而提出的十八世紀末的九〇年代，止於十九世紀末的九〇年代，具有長達約一世紀的歷史。在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明治政府以確立天皇制和形成臣民的方式解決了國家建設和形成國民這個雙重課題，並進而憑藉因日清戰爭的勝利而確立的天皇權威，使臣民的觀念在人民中間紮根。其中，有直到王政復古以前的前史，

有從王政復古到奉還版籍的過渡期，有自奉還版籍開始的正史，正史之中又有建設國家和造就國民的階段。如果最狹義地看待明治維新，那它就是為時約兩年的政治過程，包括從慶應三年(1867)以民族革命為主題的王政復古至明治四年(1871)廢藩置縣為止的三次政變，下接以國家建設為主題的明治二年(1869)至明治六年約五年間的歷史，其間有幾年和民族革命過程重迭^④。繼之以明治六年(1873)至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日清戰爭，約二十年間的歷史，再進而連接自日清戰爭至明治三十七、三十八年(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即形成帝國主義的時期。本卷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四章敘述明治六年至日清戰爭的時期，第五章敘述自日清戰爭至日俄戰爭這兩次大戰期間帝國主義的形成過程。

日本的帝國主義問題，與所謂「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或「軍事、絕對主義、封建帝國主義」問題有關，是歷史學界所爭論的重大課題。爭論的開端是所謂「志賀、神山論爭」。形成志賀、神山論爭開端的，是神山茂夫在《人民評論》1946年11月號發表〈何謂軍事封建帝國主義〉一文，批評我在同年4月號《經濟評論》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日本帝國主義的終結〉。此後，我在名古屋大學的〈日俄戰爭的研究〉（河出書房，1959年）上發表論文，題為〈（日本的）日俄戰爭研究史〉，觸及了這一問題。我接受了小山弘健與淺田光輝合著《日本帝國主義史》（第一卷，青木書店，1958年）一書中的說法。他們下定義說，日俄戰爭時天皇制「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政權代表了部分資產階級的早期帝國主義的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是（雙重帝國主義）戰爭」。我在〈（日本的）日俄戰爭研究史〉一文中說，小山氏的理論中，「似乎有一把解決關於日俄戰爭性質爭論的鑰匙」。但是，無論是對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還是對雙重帝國主義，都有重新加以認識的必要。

④此句據第四卷勘誤表補入。

列寧最早提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這一概念。他在 1915 年撰寫的論文〈社會主義與戰爭〉中闡述說，「但是一般說來，在俄國占優勢的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最新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沙皇政府對波斯、滿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完全顯露出來了，把沙皇制度對「大多數居民」實行史無前例的「壓迫」這一事實，當作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問題加以指出²²。列寧在 1915 年時提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問題，其意圖是爲了揭露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民族壓迫」的「帝國主義戰爭」中的「非常反動的反解放的性質」。列寧在同年 1915 年撰寫的論文〈革命的無產階級和民族自決權〉中，則指出了「俄國是各族人民的監獄」這一事實，說「沙皇制度具有軍事封建性質」²³。1916 年，列寧在〈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這篇論文中又指出，「俄國即使在和平時期，在更加野蠻的、中世紀的、經濟落後的、軍事官僚式的帝國主義基礎上也打破了民族壓迫的世界紀錄」，提出了開展「爲受沙皇制度壓迫的民族的分離自由鬭爭」²⁴。顯然，列寧在闡述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時，是把俄國當作「各族人民的監獄」，作爲揭發沙皇制度實行甚至「打破了民族壓迫的世界紀錄」的「中世紀的」統治的概念而使用的。日本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包括我自己——沒有理解列寧使用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這一概念的真實意圖，也沒有分析沙皇制度統治下的俄國已成了「各族人民的監獄」這一實體，只是把軍事封建帝國主義一味地理解成沙皇制度的「政權」，或者理解成是沙皇制度的「對外侵略性質」。事情難道不就

²²譯文參照《列寧全集》第 21 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第 285 頁。

²³譯文參照同上書，第 392 頁。

²⁴譯文參照《列寧全集》第 22 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第 3 版，第 354 頁。

是如此嗎？把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等同於沙皇制度的是史達林。他在 1924 年發表的論文〈論列寧主義基礎〉中闡述說：「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²⁹。

列寧所說的對於滿洲「最新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沙皇政府……的政策中，完全顯露出來了」，指的是什麼時候呢？它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觀察吧。日俄戰爭對於俄國來說，難道不同樣也是「最新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戰爭嗎？庫羅帕特金在擔任陸軍大臣時，對 1900 年發生的義和團事件主張「無論如何要把滿洲變成布哈拉」，企圖軍事占領遼東半島（《維特伯爵回憶錄——日俄戰爭與俄國革命》，大竹博吉譯，1931 年，上册第 197 頁）。布哈拉汗國是俄國於 1876 年在中央亞細亞作為保護國而建立的。維特指出，庫羅帕特金後來「決心把中國變成布哈拉並終於譜寫了日俄戰爭的序曲」。但是，沙皇政府對滿洲的侵略，「就整體而言」，是在維特以法國帝國主義的「高利貸」資金為後盾，利用國家資本鋪設的中東鐵路軌道上進行的。假設庫羅帕特金要把滿洲變成布哈拉的主張表現了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那麼，在侵略滿洲中，難道不也是「最新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占優勢」嗎？很明顯，在日本是「最新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占統治地位，它使日俄戰爭具有「最新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

關於日俄戰爭當時的日本，如果說它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那它應該是就天皇制對琉球民族的統治而言的。就是在頒布了憲法和開設了國會之後，日本也未給琉球人民以參政權，民族歧視令人側目，以致民權論者謝花升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 年）發了瘋。雖然琉球民族——冲繩縣民——不久後獲得了參政權，但在此前後，即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日本帝國主義又排除朝鮮民族的激烈抵抗，強迫推行「日韓合併」。對此，列寧在大正九年

²⁹譯文參照《史達林全集》第 6 卷中譯本，第 67 頁。

- 8 (1920年) 向俄共莫斯科組織活動分子演說時指出：「爲爭奪世界霸權、掠奪權利而戰」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正在「把一切最新的技術發明和純粹亞洲式的刑法結合在一起，空前殘酷地掠奪著朝鮮」。^{②6}如果列寧論述日本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那這不正是揭露了在天皇制的統治下，「把沙皇政府的一切辦法，一切最新的技術，同純粹亞洲式的刑法和空前的殘暴行爲結合起來了」嗎？日本帝國主義自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起，「爲了稱霸世界」而開始征服整個亞洲。企圖稱霸世界的日本帝國主義自身終將把光榮的「明治國家」引向失敗，本書下一卷將主要敘述這一過程。

信夫清三郎

1980年5月16日

^{②6}譯文參照《列寧全集》第31卷中譯本·第404頁。

目 錄

凡例	1
序	1
第一章 西南戰爭	1
第二章 自由民權	77
第三章 憲法與議會	161
第四章 日清戰爭	241
第五章 日俄戰爭	315
索引	393

第一章

西南戰爭

3

戊辰之歲，日本變更政府，推翻德川政府而興王室。由是，可謂爲近時我日本國中一大變更也。然而，此變更乃政府與政府之變更，即僅與統治者有關而與我人民無關，既毫未增進人民幸福，亦未有益於人民，權力既未增加，自由亦未增進。且今日人民之狀況已無需如今之獨裁政體。開化之程度固已可適於立憲政體，國民之願望亦在於立憲政體。要之，今日更需第二次改革，改革其政體爲君民共治，廢政府之獨裁而使人民執掌政權可也。

——《論希望明治第二次改革》

（載《海南新誌》第五號，1877年9月22日）

—

法國革命始於貴族的叛亂，而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則始於士

族的叛亂。

法國革命始於貴族的叛亂。法國的革命史家阿爾貝爾·索布爾在敘述法國革命的開端時指出：

「1789年之前的幾年是社會危機的年代，當時由於王權在財政上的無力和自我改革的無能，嚴重的政治危機在發展。也就是說，每當具有革新精神的大臣企圖使國家近代化之時，貴族階級就要起來維護自己的特權。貴族的反抗先於資產階級革命，早在1789年以前就使王權動搖。」

法國大革命前夜的危機，在法國於1775年支持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更加深重。法國財政總監芮克靠公債籌措軍費，却由此而出現龐大的財政赤字，導致財政破產。1781年，芮克辭職，卡隆繼任，此後，危機迅速加深。企圖消滅財政赤字的增稅早已達到極限，要實行增稅，就必須向迄今為止一直免除納稅義務的貴族和神職人員（僧侶）征稅，實行對一切人同等課稅的新辦法。1786年，卡隆向國王建議實行財政改革，企圖向「特權」進攻，實現賦稅平等。國王召開了早就存在的顯貴會議，它是一個集中顯貴的諮詢機構。由國王指名參加的有高級神職人員、大領主、高等法院議員、地方總監、國務顧問官、各省三級會議及城市自治體的成員等共一百四十四人，於1787年2月齊集於顯貴會議。但是，他們不與卡隆合作而企圖維護自身作為特權者的特權。4月，卡隆辭職，由大主教布里昂接替。但是，要解決財政危機，布里昂除了採用卡隆的辦法外，別無他策。5月，布里昂解散了顯貴會議。高等法院繼顯貴會議之後繼續抵抗。第二年即1788年5月，掌璽大臣拉穆瓦尼翁提出進行司法改革，以粉碎高等法院的抵抗。統治著高等法院的司法貴族，為了維護貴族的特權，向所有的貴族和神職人員發出呼籲，企圖挑起反對國王的叛亂。貴族